

# 民国学者应用、整理和研究《清实录》初探

谢 贵 安

(武汉大学 a. 历史学院 b.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武汉 430072)

**摘要:**民国时期,抱持不同立场的清史馆、文献馆、史语所和北大的学者们,怀着不同的目的,对清朝的历史及其文献《清实录》等予以密切关注、应用、整理和研究。作为清遗民的清史馆馆员及伪满学者罗振玉等,采用《清实录》史料编纂《清史稿》,或直接整理该实录早期版本,以达到为旧朝存史的目的。与清遗民相反的是北京大学教授孟森这样的共和派史家,对清廷篡改和修饰《清实录》的行为表达了强烈不满和激烈批评,同时又广泛应用其中可信的史料从事清史研究工作。持中立立场的是信奉科学观念和近代学术方法的史语所徐中舒和故宫博物院的年轻学者方甦生、单士元等,他们对《清实录》的改修和价值,通过实证给予客观的评价。尽管立场和方法各异,但民国学者们一般都比较认真和敬业,使《清实录》的研究一开始就步上较高的台阶,为以后的整理和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关键词:**民国学者;《清实录》;机构;史学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3)01-0136-11

《清实录》是清代官方纂修的一套有关皇帝事迹及相关朝政的编年体史料性史著。清朝灭亡后,民国政府急于对前清历史盖棺定论、保存史实或引为殷鉴,先后设立清史馆、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机构,对《清实录》等前清史料展开应用、整理和研究工作。对于《清实录》这种现实性强且价值很高的前代史料,民国学者都十分重视,或依托上述各机构,或单枪匹马,展开了较为密集的探讨和研究。由于政治态度和学术素养不同,他们形成了不同的群体及其特色:清史馆馆员们抱持的清遗老立场,使他们在对待《清实录》上不出传统窠臼,偏重应用而缺乏甄别;孟森的革命背景和北大教授身份,使他对《清实录》纂修中的改修粉饰问题批评有加;方甦生和徐中舒的科学立场和中立态度,则使他

们用近代学术方法整理《清实录》,并作出公正评价。虽然政治立场或有不同,研究方法各有偏重,但他们大都倾心于《清实录》史料的发掘、版本的比勘和价值的定位。他们对《清实录》的研究,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是中国学术史、史学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个创举,对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和港台地区的同类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然而,对于民国学者研究《清实录》的状况,学术界关注较少<sup>①</sup>。本文拟对此问题予以集中探讨。

## 一 清史馆馆员对《清实录》的应用和传抄

像古代任何一朝修纂前朝纪传体正史一样,清史馆馆员在撰写《清史稿》时,除了应用《清实录》史料外,很少去甄别和研究《清实录》本身。明初利用《元实录》修成《元史》后,不仅没有对它进行研究,甚至连

收稿日期:2012-07-04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清实录研究”(批准号:10FZS00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之重大项目“实录修撰与中国传统史学流变”(批准号:06JJD770020)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谢贵安(1962—),男,湖北襄阳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明清史。

《元实录》也没有保存。清史馆虽然是民国政府的机构,但大多数人持清朝遗老的立场,使得他们在编纂《清史稿》时,仍然是沿用传统的方法,只利用《清实录》的史料,不对它作甄别和研究。这与故宫博物院、史语所和北京大学等学者在整理内阁大库档案时一般都对《清实录》进行版本考察、文字比勘和学术定位相比,显现出传统与近代的差异。

1914年,北洋政府在北京故宫前朝的国史馆中设立了清史馆,任命赵尔巽(1844—1927,字次珊)为清史馆馆长,聘请清朝遗老和学者等100多人、工作人员200多人(另有名誉职位300多人),开始利用前清遗留下的各种史料编纂清史,其中《清实录》是重要的史料之一。

民国时清史馆的学者都比较重视《清实录》的史料在编纂《清史稿》中的应用。他们认识到,修清史必须搜集史料,而搜集史料,《清实录》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参考资料。清史馆员于式枚等人提出:“修史之急务,必先聚书”,“不厌其详,不必其复”,“自《实录》、《正史》外,杂编野纪,可资证援参考者,一一分疏其目,具有条理”<sup>[1]26</sup>。此言虽强调了要扩大史料范围,但首先还是承认了《清实录》在清正史(即清国史)中的基本史料地位,因此另一位清史馆员金兆蕃特别强调“故当以遍考官书为第一义”,“故当以甄采群籍为第二义”<sup>[2]79</sup>,这就肯定了作为官书中重要部分的《清实录》的价值。在拟定体例时,馆员吴士鉴建议修本纪:“当以史馆历朝本纪为依据,复以《圣训》、《实录》、《方略》互证之,删繁就要,准诸前史体例。”<sup>[3]186</sup>一般而言,清史馆员们均自觉遵循重视《清实录》的学术理念。在清史馆任编修长达十年之久的张尔田,撰修了《清史稿》的《乐志》八卷、《刑法志》二卷、《地理志·江苏》一卷、《图海·李之芳列传》一卷以及《后妃传》(后未被清史馆采用)等内容,在写作中,始终贯彻重视实录的宗旨。他自述了对《后妃传》编纂的过程:“甲寅秋,余以庸薄,膺聘纂言,每感前修,思宏绍勒”,当时吴昌绶(字伯宛)“首创长编,以草相囑,所采官私著籍、玉牒、实录、官史,仅数十家,并信而足征,文直事核”<sup>[4]9</sup>,他即按照吴氏的方法,采录了《清实录》等史料。张笑川曾以《图海·李之芳列传》为例,把它与《清国史》(中华书局1993年据嘉业堂钞本影印)的《图海列传》、《李之芳列传》对读,发现《图海·李之芳列传》中的“图海传”有很多重要史实为《图海列传》所无而采自它书,如关于图海反对“撤藩”一事,即为国史原传所无而采自“实录”<sup>[5]</sup>。

清史馆员们在应运《清实录》时,也对该实录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研究,如发现《清实录》“臣工并不附传,是实录不同于古也”<sup>[1]24</sup>。柯劭忞在给罗振玉的回信中称:“《国朝实录》与前代体例迥殊,不载臣工之事”,这是较早论及《清实录》不同于此前的实录体——“编年附传体”的观点。柯劭忞还对《清实录》有简略的评价:“即沿革诸大政及兵事首尾亦略而不书。所书者内外官之黜(涉)[陟]及忠义之褒顺,节孝之旌表而已。”并认为:“近人所(摹)[纂]十一朝《东华录》全出于此。”<sup>[6]</sup>这一认识后来被超越,方甦生认为《东华录》并非全出于《清实录》。

虽然清史馆上下一致认为应该重视《清实录》的作用,不过仍有部分馆员不安于心于整理史料和编撰史书,“多懒于翻书考证,仅据《国史》之传而删节之,翻《实录》及《东华录》尚嫌其烦”<sup>[3]45</sup>,这就破坏了清史馆重视实录在编纂中的地位共识。

除了这部分人外,清史馆其他馆员基本遵循了重视《清实录》史料价值的原则。后人对清史馆重视实录的做法多有留意和赞许。冯尔康指出:“《清史稿》的著者们从‘实录’、‘会典’、‘方略’、《国史列传》、各种档案文献私人著述中取材。”<sup>[7]57</sup>中华书局指出《清史稿》“根据的大部分材料如《清实录》、清代的《国史列传》、《清会典》和一些档案”写成,也承认了清史馆员对《清实录》的重视<sup>[8]《出版说明》</sup>。

民国时期的清史馆学者们不仅在编纂清史稿时采用了《清实录》,还为了弥补经费不足而代为传抄了整部的《清实录》。清史馆开馆处在北洋军阀的混乱时期,经费严重短缺,馆员生活艰苦。1922年冬,清史馆馆长赵尔巽接待了来访的浙江吴兴县南浔镇嘉业堂主、上海丝绸富商刘承干,讲述了《清史稿》因经费拮据虽历时8年仍未修成的窘境,刘承干于是出巨资雇请清史馆员们代为抄写《清实录》、《清国史》、《湖录经籍考》等书,以充实嘉业堂的藏书,其中抄校《清实录》耗银“殆近二万金”<sup>[9]</sup>。清史馆经过半年的努力,完成了《清实录》和《清国史》的抄写,但由于清史馆是为了谋得刘承干的经费,因此抄写时并不注意质量<sup>②</sup>。除了传抄外,清史馆员们还利用《清实录》的史料,撰写清史著作。如金兆丰曾任清国史馆实录馆纂修,参与纂修《宣统实录》(定名为《宣统政纪》)。民国成立清史馆后,又受聘为馆员,参与《清史稿》修纂。他利用工作之便,搜集了不少清代史料,撰成了《清史略》一书,1935年8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发行时改名为《清史大纲》。

清史馆员们是民国第一批关注《清实录》价值并加以应用的学者群体,开启了应用和研究清代实录的学术大门。

## 二 北京大学教授对《清实录》的研究与批评

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院校,因为孟森(1869—1937)的加盟,使它在《清实录》的研究中斐声学界。1911年辛亥革命后,孟森积极参与了建立民国政府的各项政治活动,曾任共和党执行书记和国会参议员。1914年,孟森结束了政治活动,开始了清史研究的学术生涯。

孟森研究清代历史,特别重视利用清代档案、《清实录》、《朝鲜李朝实录》等史料,“从孟森的明清史学著述来看,一般学者普遍认为孟先生至少精心研读过《明实录》、《清实录》和《朝鲜李朝实录》,这三种‘实录’合计达9181卷”<sup>[10][11-12]</sup>。他到北大任教时,北大已乘“八千麻袋”档案散出宫中的机会,收藏了不少原属内阁典籍厅所掌的清代档案。孟森在对清代档案研究和利用的同时,也对《清实录》予以特别重视,对该书的价值有独特的认识。由于政治立场是反清而趋向民国,加上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因此他对清朝篡改和修饰《清实录》的现象批评尤多,言辞也十分激烈。

孟森对《清实录》直接论述的文章有四篇,即《印行清实录议》、《康熙重修太祖实录跋》、《清世祖实录初纂本跋》和《读清实录商榷》。在这些文章中,他主要从版本和价值角度对《清实录》展开研究,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介绍和辨析了他所见所闻的清代《实录》的纂修、版本及流传情况,为后世研究《清实录》的收藏和传播提供了重要线索和资料。首先,孟森对《清实录》的起源及其原始状态作了叙述。在《康熙重修太祖实录跋》中称:“清太祖第一次初纂《实录》,在太宗天聪九年。先成太祖战迹之图,每图带说。既成,而又摘图中之说,别为一本。两皆名之曰《武皇帝实录》”,之所以要修此书,是由于“汉人以中土旧有之帝王体制相推奉”;然而,清朝起初“虽有留纪念以为永存之计,未知《实录》之为何物,故文字体例,与历代之《实录》殊,即与后来规仿历代《实录》以为《实录》者,形式亦自迥别也”<sup>[11][324]</sup>。其次,对《清实录》的收藏制度有所介绍与讨论。他说:“清修《实录》:定制缮必五分,每分又具汉、满、蒙文各一部。大本红绫面者两份,一贮皇史宬,一贮奉天大内。小红绫面者两份,一贮乾清宫,一贮内阁实录库。又有小本黄绫面一分,

亦贮内阁实录库。其常取入讲筵用者,当是此小黄绫本,以其较轻而取用较便,以常供御览,故用黄面。”<sup>[11][622]</sup>孟森对清代实录的秘藏和传阅制度作了解释:“《实录》本藏中秘,外间不得共见。入国史馆供职者乃见之。定制:史馆奉旨为诸臣立传,所采事迹,必以《实录》所见者为准;私家传状碑志,止许作履历生卒等年月日之参考。故史臣例得详阅《实录》。阅《实录》不禁其有摘抄本,然亦无刊刻传布者。”<sup>[11][619]</sup>但这一制度从蒋良骥那里开始打破,他在乾隆三十年入史馆后开始抄纂实录,编成《东华录》,“略成纪录时政之一体”<sup>[11][619]</sup>。再次,他对内阁大库残本、绘图本等《太祖实录》的版本情况及价值作了分析。《太祖实录》经太宗初修,康熙再修,至雍乾定稿,凡经三修。那么内阁大库所藏的《太祖实录》残稿到底是什么时候所修呢?他根据该本“在太祖已改谥为‘高’之后,谓之‘高皇帝实录’”的情况,断定不可能是太宗朝的初纂本,同时“偶检其残存之文”,发现“如英、睿、豫三王之母殉太祖时,由太宗及诸王之强迫情状,尚仍前不改。而乾隆定本尽没之”,又断定它也不会是乾隆本,从而认定它是“康熙重修《太祖实录》”;他对绘图本《太祖实录》也有自己的了解和认识,认为它为“图之篇幅所限,不能任意更动,祇可扣准字数略加增损,故虽有改动,又不似定本之称意变置”,因此它的“意改之迹,反不及定本之多;所存初纂本之原状,则且多于再修本”<sup>[11][324-326]</sup>。这就为后人辨析和利用繁杂的《太祖实录》的版本,提供了线索,指明了方向。复次,对北平书肆中发现的太祖、世祖《两朝实录》(也称《皇朝实录》)的版本作了鉴定,明确断定为康熙时所修,其中《太祖实录》是康熙改修本,而《世祖实录》是康熙年间的初纂本,指出这两部《实录》的发现对于研究清代实录和清代早期历史有重要的意义。孟森曾听友人称书肆中有新收得共十函的《两朝实录》,分别是《太祖实录》和《世祖实录》。他指出其中的《太祖实录》,“为康熙修本,则又为故宫已佚而别无他传本者,得之亦足慰愿见清掌故递嬗递变之真相”<sup>[11][325]</sup>;对其中的《世祖实录》,根据每卷首行所题世祖章皇帝尊号和纸墨色泽,断定“决为初纂本无疑”<sup>[11][478]</sup>。孟森动员北平图书馆袁守和馆长斥巨资分别从书商和日本人手中购下了这两部实录,并建议故宫博物院将这部初纂本《世祖实录》与太祖、太宗初纂本合在一起印成《三朝初纂实录》。

第二,应用比较方法,为《清实录》研究起到示范作用。孟森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将《清实录》与《东华

录》进行比勘,从而弄清楚《清实录》的流变与修改情况。孟森在《读清实录商榷》一文中将蒋良骐、王先谦所编的《东华录》与今本《世宗实录》比较,来证明《清实录》随时随意修改。他称自己“抽取《世宗实录》中曾静案验之,一开卷则瞠目结舌,为之骇然。凡《王录》中之连篇累牍所涉曾案,《实录》中乃无一字”,让人感到“在《实录》中,世宗朝并未有此一惊天动地之大案”,他坚信自己有关曾静一案的“改削”,应该“在《王录》已成之后,即必在光绪中叶”的判断是正确的<sup>[11]621</sup>。同时,他还将蒋录与王录进行比较和对勘,指出“《蒋录》虽简,而出于《王录》以外者甚多”,如顺治间言官因论圈地、逃人等弊政而获谴的内容,《蒋录》就有,《王录》竟无;他“初疑王氏自以己意为去取,以顺时旨,既而翻检故宫定本《实录》,则与《王录》同,然后知王所见之《实录》,非蒋所见之《实录》”<sup>[11]620</sup>。以此证明,《世宗实录》中被《蒋录》所抄的内容,在《王录》所抄之前已被删削,可能是被经筵日讲官如翁同龢等所随意删改<sup>[11]622</sup>。他还提出了解决《清实录》是否随意修改的方法,就是将作为经筵日讲用的小黄绫本与北京甚至盛京所藏的红绫本等其他版本对勘。孟森提出的方法和思路是可取的。

第三,对清朝统治者对《清实录》的修改和粉饰提出批评,断言清人对待实录态度不严肃,随意修改、隐讳和增饰。这种修改和讳饰,不仅在乾隆以前对前三朝实录是如此,而且在乾隆之后于经筵日讲时也随时增删实录。孟森当然知道,“乾隆初,改定太祖以来《三朝实录》,世多知之。其改定乃自雍正间所已奉敕,至乾隆初毕工”<sup>[11]621</sup>,因此他特别想弄清三朝实录之后的《清实录》为什么还有不断修改的现象。他通过《清圣祖实录》中有关逃人、圈地、开捐等事被讳言,断言“清代帝王,亦自知非善政,当时则威福自专,后世以为慙德而去之”;对《清圣祖实录》隐讳圣祖笼络“理学名臣”李光地一事也有分析:“李光地事,乃本人之私恶,何故于实录讳之?参以光地之自撰《语录》,及李氏子孙所布洗雪之语,合诸家公私文证以究之,以夺情诱光地者,圣祖也。光地特利令智昏,一时受愚,而终身遂以理学为圣祖穿鼻,他人讲理学而格君之非,光地讲理学而扬君之是”<sup>[11]620</sup>。“在李为曲学阿世,在圣祖为收服人望,手腕高于百王”,并认为是后世帝王“于《实录》中削之,存寥寥数语,以纪其事目而已”<sup>[11]621</sup>。孟森根据“故老”传言,说清制“日讲官每日进讲祖宗《实录》一卷,翁同龢为师傅,值讲筵时,即于进讲《实录》之便,为酌改《实录》之事。是光绪朝又改

《实录》,乃事实也。改于讲筵之便,绝无敕改痕迹”,于是断言“清改《实录》,乃日用饮食之事也”<sup>[11]622</sup>。孟森认为清改修先祖《实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后世君主在“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时树立光辉榜样,故不断修饰祖宗的形象,结果导致清世随意改动《实录》的不良习气,“惟其法祖之意,过犹不及,备使祖宗所为不可法之事,一一讳饰净尽,不留痕迹于《实录》中,而改《实录》一事,遂为清世日用饮食之恒事,此为亘古所未闻者”<sup>[11]619</sup>。他认为这样做其实得不偿失:“因法祖而尊祖惟恐不至,因尊祖之至而不免诬祖,使人益疑清之祖先,事多不可告人,尽待子孙为之文饰,则清之祖先,反因此有怨恫矣。”<sup>[11]621</sup>又称:“清之开创,为太祖、太宗、世祖三世,史家既有特注心力之例,而无奈清之后王,务掩开创三朝之真相,取已勒定之纪载,一再以意润色之,自以为尽孝子慈孙之力,以尊显其祖宗。无论祖宗自有未漓之真气,不雕琢之完璞,非守文之世为粉饰之习者所能知,即此屡改而屡将初定之本作废,转使天下疑此一代之祖先,何以多不可告人之隐如是。是欲彰其全美,而反使人疑其有隐慝。”<sup>[11]477</sup>孟森对清实录的评价,虽然言辞过于激烈,部分推断也遭到否定,但他研究的方法和理论还是很有意义的。

除了对《清实录》直接进行研究和评述外,孟森还充分应用《清实录》的史料从事清史研究工作。在《明清史讲义》<sup>⑤</sup>之“《清实录》所详之世系”一篇中,利用《清实录》的记载,用表格形式列举了从一世布库里雍顺到十世太祖努尔哈赤的清室世系;然后,又将开国以后清室的世系,仍然利用《清实录》的记载,用表格的形式列举了从太祖到宣统的世系。他在第一章“开国”之第一节“太祖”中,叙述李成梁之诛阿台时,称“在万历十一年,与《清实录》相合”,又称“不数年间,明已假借太祖,官以都督,宠之以龙虎将军,亦与《清实录》略同”<sup>[12]380</sup>。在第二章“巩固国基”之第八节“盛明之缺失”中,对圣祖废太子的事件,用域外文献《朝鲜实录》“清国废其太子胤礽,本朝方物之赠太子,勿令赉来。其废黜诏制略曰:‘荒淫无度,私用内外帑藏,捶挞大臣以下,欲为索额图傍伺朕躬,若不于今日被鸩,即明日遇害云’”,证明康熙帝废太子胤礽时陈列的太子恶行,并非世宗修《圣祖实录》时所诬:“太子过恶,前辈别无记载,故祇有疑其冤抑,意为夺嫡之余,世宗朝修《圣祖实录》多未可信……至《圣祖实录》谓尽出雍正朝伪撰,则于事理为不必然”,“则废太子诏,实是当时原文”<sup>[12]464</sup>。他在《明清史论著集刊续

编》中,也经常应用《清实录》的材料,如对于清朝开国传说中三仙女沐浴、佛库伦生布库里雍顺一事,他根据《太祖武皇帝实录》中“雍顺”两字作“英雄”的记载,认为库布里雍顺实际上就是布库里山的英雄之义,“布库里既为诞生之地山名,英雄则言其地之豪耳。后来改为布库里雍顺,以抹杀其意义,使成一不可解之夷语”<sup>[13]62</sup>。这说明,孟森在清史研究实践中,还是对《清实录》史料价值十分重视的,特别是对初纂本或较原始的版本的價值相当肯定,他否定的只是《清实录》的不断饰改现象。

### 三 故宫博物院学者对《清实录》的发现、整理与应用

紧随清史馆员之后,重视、整理和研究《清实录》的是故宫博物院的学者群体。1925年10月10日,民国政府成立故宫博物院,沈兼士出任该院文献馆馆长,率院中同仁对故宫的清代内阁档案进行了系统的整理。

1931年,文献馆发现“清史馆存有实录稿本数种,其中有初纂修改本,重修本,及清史馆蒙藏院二处之补钞本。初纂及重修本的稿本,经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整理后,除每种所用的纸张及格子等,彼此多有不同外,就它的外形看,可以分为长形本与方形本两种”<sup>[14]</sup>。其中有一种题为“太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实录”,书凡四卷,红绫装,白鹿纸,画朱丝阑,楷书,半页九行,行二十二字,无序、表、凡例、目录。故宫文献馆将这些发现的清代实录,编成《故宫文献馆现存实录总目》一书予以详载,如对清史馆(清国史馆后身)旧藏的十种《实录》作了著录:长形本六种,方形本计二种,另有清史馆补钞本一种,存太祖二册,太宗九册,世祖一二册,圣祖六册;蒙藏院补钞本一种,存世宗五册,高宗、仁宗、宣宗各四册。稍后,李德启编成《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满文书籍联合目录》,于1933年出版,其“大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条注:“《清太祖武皇帝叙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四卷四册,分装两函,红绫封面,白鹿纸,朱丝栏楷书,每半页九行,行二十三或二十五字不等,无序、表、凡例、目录。”<sup>[15]</sup>故宫博物院在整理实录和编纂叙录的基础上,将其中的汉文《清太祖实录》的多种版本印刷出版:1931年,故宫博物院铅印了《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10卷本),并石印了《清太祖武皇帝努尔哈赤实录》;1932年,该院又铅印了《清太祖武皇帝努尔哈奇实录》(4卷本),并石印了《清太祖武皇帝努尔哈奇实录》。

故宫学者们的工作不限于文献整理,而是对《清实录》作了深入的研究。其中,方甦生、单士元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据单士元称:“故宫文献馆曾集体将旧本与改本进行校勘,并参考满文老档,由方甦生先生执笔,根据校勘资料写出《清代实录纂修考》一文,发表在《辅仁学志》。”<sup>[16]</sup>由于方甦生代表故宫博物院执笔整理校勘成果,因此他成为当时研究清代实录最为深入的学者。他的代表作是两篇论文,其一是《清太祖实录纂修考》,其二是《清实录改修问题》。

《清太祖实录纂修考》<sup>[17]</sup>在《清实录》的研究中,主要有如下成就。

第一,缕述了《清太祖实录》的纂修与重修过程,认为“《清太祖实录》的纂修,始于天聪时”。最早的那部只是《太祖实录图》,原本可能在嘉庆二年乾清宫火灾中被焚毁。继《实录图》纂修成的是《太祖武皇帝实录》,他认为,“此本想是以《太祖实录图》去图加尊谥写成的”。这个去图加谥而成的《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初纂本是否存在?有人认为1931年发现的那部四卷本的“太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实录”就是崇德元年初纂本。但方甦生等则“颇疑是顺治年间重缮之本”,因为“此四卷本《太祖实录》的纸质、纸色、字体、装璜,均与顺治年间所修四十卷本《太宗文皇帝实录》相同。可知其缮成年代必极相近,似非崇德元年所修原本”。不过,方甦生等人只主张此本为顺治“改缮”之本,够不上“重修”程度,“因其中增删之处似不甚多”:称太宗之母为“天聪皇帝母”,尚未改作孝慈武皇后;太宗也只作“天聪皇帝”,未写作“太宗皇帝”,“可见仍是初纂时的书法,未加修润”。方甦生认为,到了康熙年间,“乃将《太祖实录》大加增删,改四卷为十卷,并增加序、表、凡例、目录,合为十二卷”。康熙改修的目的,是因为当时《太宗实录》被认为“字义未当,姓名舛错”,“前后颠倒”,有所遗漏,琐屑繁书,前后重复,不书干支,汉译满文舛错、俚俗和“语气未顺”。已重修完毕,又决定《太祖实录》也“照《太宗实录》体式重修”,以与后者体例一致。雍正十二年纂修《圣祖实录》告成,又取太祖与太宗、世祖《实录》同时加以校订。于是,《清太祖实录》再一次被重新校订。“这一次的校订,至乾隆四年十二月,始告成书。计实录十卷,序表凡例目录三卷,合为十三卷”。

第二,考辨了《清太祖实录》版本的流传情况,并对传世的版本作了鉴别。方甦生认为,康熙朝重修本,只有满文小本一部保存下来,“正本均已无存”。

他指出,日本有一种传钞本《清三朝实录》,其太祖朝的谥号为“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弘文定业高皇帝”,“乃康熙所改定,当是据此次重修稿本传钞而流落海外者”;北平图书馆当时所购钞本《皇朝实录》中的第一至第四册为《太祖实录》,计分八卷,“虽分卷情形微有不同,其内容则颇似康熙重修之本”,并以满文小本校对后发现,像大妃被逼殉主一事,在乾隆定稿的满文小本中已被删去,此本仍保留着,“因而知其仍是根据稿本传钞的”;他还对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的康熙间重修的《太祖实录》残稿本九卷进行了分析,“分之再稿、三稿、四稿三种,都是涂乙窜改甚多的”;而罗振玉亦藏有康熙间重修《太祖实录》的残稿本十四卷,“则分初稿、二次稿(等于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三稿)及三次稿(等于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四稿)”。他认为,康熙间重修《太祖实录》时,“似未焚稿蕉园,所以顺治重钞旧本及此次所纂稿本,幸得流传至今。而所缮正本则如上文所述在雍乾校订重缮后反被焚毁了”。方甦生还对天聪本《太祖实录图》的流变作了讨论,指出:该本乾隆时曾经重绘三部,一贮宫中上书房,一藏盛京崇谟阁,一藏热河避暑山庄;其名为“满洲实录”,每事先图后说,文字是横画三栏,上满文,中汉文,下蒙文,对照书写;虽名实录,实未尽合一般实录体裁,“贮于上书房的一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整理实录时,在宫东暖阁发见,崇谟阁的一部,已有辽宁通志馆等印本。避暑山庄的一部,闻已流入日本”;这部“《满洲实录》”有不同的称呼,或称“开国实录”,或称“太祖实录战图”,或称“太祖实录图”,“名虽纷歧,实即一书”。他对《太祖实录》的各种版本尊藏之年、存佚状况作了总结,并以列表形式作了陈述,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早对《清太祖实录》版本进行详细、深入讨论的成果。

第三,对《清太祖实录》的内容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校勘,发现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改变。方甦生等把顺治改缮本《太祖实录》称之为“旧本”,把雍乾校订本称之为“改本”,将旧本与改本“互校一通”,并将校勘的结果归纳为八项:甲、旧本记事有为改本删略者;乙、改本增出上谕五十三通,旧本均无之;丙、旧本记事,有记月不记日者,改本均为补朔,旧本记年而阙月日者,改本均称正月朔;丁、旧本于明多敬词,改本均改作平行语;戊、旧本字法质朴,改本润饰而含义不同者;己、旧本记载女子之名,改本均删去;庚、旧本人地名译法及称谓,改本多为改易;辛、旧本文辞朴俚,改本增饰,几乎逐句不同。方甦生针对前人认为《清太祖实录》

大规模修改是在乾隆时的观点,坚信自己的意见:“论删削增饰,乃康熙时为之,雍乾校订,不过藻润文字,画一人名地名译法而已”,自己“与向来归罪于乾隆作伪的说法不同”。他通过考证和校勘发现,“凡雍乾本所无者,在康熙定本中均已删去,而雍乾本较顺治改缮本多出五十几道上谕,也是康熙重修时所增加,雍乾校订,不过又加以润色而已”。他发现,康熙间重修《太宗实录》准则,也是“照《太宗实录》体式重修”的《太祖实录》的准则,实际上是康熙间为太祖讳饰的标准。所谓“字义未当”是针对旧本多用敬词称呼明朝而言;“姓名舛错”是针对旧本不避丑恶字面、前后不一致及记载妇女名字而言;“前后颠倒者”是针对旧本卷一总叙太祖功业后加入诸部一节,改本分叙于各部灭亡之后;“原档所载,于例应存而遗漏者”,是为增加上谕五十三通而言;“琐屑事务,例不应书而书者”,是针对孟革卜鹵私通嫔御、莽麦冲三妇击敌等事而言;“不书干支,祇书年月日者”,是针对旧本月日均不书干支,且有不著月日而言;“满汉对勘,词义舛错者”,是针对像天命四年六月取开原会议屯留二日一语等事而言;“满汉词义虽合而汉文近于俚俗,且语气未顺”,是针对旧本像字法质朴、文词朴俚这样的语例而言。康熙朝重修本经过这些增删后,“已完全变成改本面目了”,因而断定“删削增饰乃康熙时为之”。要言之,康熙重修本《太祖实录》增删旧本的目的,不外乎对旧本的“不雅不美的事”和“不雅不美之语”加以删润,目的是“为尊者讳”。总之,“改本虽稍有正误之功,究不能掩饰饰之过”,“旧本不失为清开国期比较质实的史料,虽有小疵,易于补正。改本却是瑜不掩瑕。无甚可取”。

方甦生的《清太祖实录纂修考》,不仅篇幅长,而且史料丰富,不仅用了清朝太宗、世祖、圣祖、仁宗《实录》的二手史料,而且用了《满文老档》和内阁大库所藏各种档案等一手史料,如满本堂收发黄绫本实录档、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初十日题稿档等。同时,应用了版本学、校勘学等方法,他特别提到“陈援菴先生对于本文的方法及文字,多所是正”,显然是接受了陈垣校勘学的方法。这些使得该文不仅厘清了《清太祖实录》的版本及其流传问题,而且展示了先进的学术方法、扎实的学术功底和认真的敬业精神。

继上文之后,方甦生又撰写了《清实录修改问题》一文,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述孟说,即复述孟森的观点;一是抒己见,即阐发自己不同于孟森的观点。孟森认为篡改实录是清朝之常事,方甦生则提出不同的

意见,指出“心史先生之说,新颖独到,发人所未发,而夷考《实录》,似未尽合”,认为蒋良骥《东华录》并非专抄《实录》,而是“信笔摘钞,逐年编载”,红本及各种官修之书亦在采录之列,并举大量的例子说明。方氏还指出,蒋、王二人所采《清实录》,当系史馆所藏稿本而非正本,有时候“稿本纂入,而定稿删去”,曾静一案,乾隆所纂修《世宗实录》或删或改,以掩其迹,“设举此案以谓乾隆所修《世宗实录》不尽征实则可,谓系光绪私改,则立证未足”。他特别指出:“实录非随时修改之书”,清代前三朝实录,曾经一再重修,“余则未闻修改”,并用大量证据作证明,断言:“综观诸证,足见《清实录》非随时修改之书,讲筵私改之说,实为无据,乾隆以后,固未有重修《实录》事也。”并坚持己见:“清代《实录》之修改,惟康熙朝为甚,初被华风,不复不尔,雍乾而后,仅曾校订,一经纂成未闻修改也。”“心史先生之说在认定蒋、王二录,全出自《实录》,不知二录于《实录》以外,固尝兼采他书,不能以《实录》与二录有不同,遂谓《实录》曾经修改。”<sup>[18]</sup>方甦生以严肃认真的态度,通过实证的方法,对清廷改修《清实录》确定了界限和范围,从而肯定了该实录在研究清史中的地位。

故宫博物院研究《清实录》的学者,还有单士元。他曾随故宫文献馆同事一起校对《清实录》,又曾在1934年左右与其师孟森“以《东华录》校对《实录》”,“得知蒋、王均对《实录》有所取舍选择而成”。1934年,单氏以“整理实录时所记的札记”撰写了《整理清代实录记》<sup>[16]</sup>一文,堪称中国较早的研究《清实录》的论文,1984年发表时,作了一些修改。该文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介绍了故宫博物院专家们对《清实录》版本的发现与整理过程:“在清点文物工作中,在乾清宫查到小红绫本清代历朝实录。案清代故事,在乾清宫皮藏历朝实录是清王朝典制。乾清宫本为皇帝寝宫。皮藏祖先实录有寓‘敬天法祖’之意。内阁有实录库,是专收藏实录之库房,有小红绫本、有小黄绫本各一部。在皇史宬和沈阳故宫各藏一部蝴蝶装的大红绫本。实录库中的小黄绫本是实录修成后又加小改的稿本。原来实录纂修馆在修实录时,随时缮写分卷进呈皇帝审核,若有改动,则在本上粘贴小黄签。实录馆再根据黄签所写更改之处进行修改,然后即分缮大小黄绫本的正本实录。内阁实录库官员习称有小黄签的小黄绫本为副本。”对《清实录》的其他版本也作了介绍:“案清代制度,内阁每日必须将前朝实录送

呈皇帝阅读一、二卷,以示效法祖宗。实录分卷页数都极少,为了便于皇帝阅览。每日送呈皇帝阅览的实录,即实录库收藏的小红绫本。清代修定实录后,照例用满、蒙、汉文分别缮写三部,正本用安徽泾县榜纸,画硃丝栏,墨笔恭写楷字;存在国史馆的副本,则用东昌粗纸印蓝格,墨笔书写,有长形本、方形本两种,是为修史之用。”然后,对《清实录》的收藏和存佚情况略作说明:《清太祖实录》的各种本子,“过去均由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收藏,大都完整,间有缺佚”,而“紫禁城外皇史宬所藏蝴蝶装大红绫本,残佚较多。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之事,皇史宬亦遭掠夺”,“九一八”事变后,“故宫文物包括图书档案,一度南迁,后来运回北京已非全数。内阁旧藏小红绫本实录,很早即拨国民党政府文官处,据传早已流落散失”。

第二,对《清实录》的修改粉饰作了揭露,称“检清代前四朝实录,曾一再修改并润色词藻”。皇太极继汗位后,“在天聪九年曾为努尔哈赤编纂实录,即前所称的《满洲实录》。崇德元年修订《太祖武皇帝实录》。由于不娴熟汉文,对皇帝尊严的语汇词藻朴实,因此后来屡加修饰,并有讳事实不使见之实录”。单士元参与过当时故宫文献馆校勘清代实录的工作,因此便直接从方甦生所撰《清太祖实录纂修考》一文中“移录”了一些校勘例子。如旧本写:“太祖欲以女莽姑姬与孟革卜卤为妻,放还其过。适孟革卜卤私通嫔御,又与刚盖通谋欲篡位。事泄,将孟革卜卤与通奸女俱伏诛。辛丑年正月,太祖将莽姑姬公主与孟革卜卤子吴儿代为妻。”改本则写作:“其后上欲释孟革布禄归国,适孟格布禄与我国大臣噶盖谋逆,事泄,俱伏诛。辛丑春正月庚子朔,上以妻吴尔古代。”他指出改写本《太祖实录》“删繁就简,掩饰真像,其史料价值已远逊旧本”。

故宫博物院专家对《清实录》的整理与研究,是最为系统和全面的学术成果,对1949年以后北京和台北两地的故宫博物院对《清实录》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 四 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员对《清实录》的整理与研究

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对《清实录》的研究工作,并非孤立进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在对清代内阁档案整理研究的同时,对《清实录》做了较多的工作。相对于故宫学者对《清实录》的学术研究来讲,史语所更侧重于对《清实录》的整理与应用。

史语所学者中,对《清实录》有较多关注和论述的,首推徐中舒。1929年2月,徐中舒经陈寅恪推荐,被史语所先后聘为编辑员和研究员,参加并实际主持了内阁档案的整理工作。从是年9月底开始,在所长傅斯年的总体规划下,徐中舒督同书记以及工人共21人正式着手整理档案。当时,北京大学国学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清华大学历史系、禹贡学会等先后开展内阁档案的整理工作。史语所在这些单位中,以“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为宗旨,将整理档案当作“科学”工作,严谨认真。在整理清代档案过程中,徐中舒接触到《清实录》。由于善于将档案与实录相对照,发现后者中存在着大量的曲笔讳饰之处,因此对《清实录》的不断改修提出了批评。

徐中舒对《清实录》的讨论和评价,主要见于《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sup>[19]</sup>和《再述内阁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sup>[20]</sup>二文。在第一篇文章中,徐中舒发现:“内阁档案中有涂改本《三朝实录》的残本,内太祖朝较为完全,有初改本、二次改本两种,顺治五年三月份实录封面,并有二次改正字样。太祖朝初改本原文即老档译本。此可以天命三年四月太祖伐明所书七大恨为证。七大恨为太祖、太宗以来屡次对明用兵的口实,残本实录第一次改本,涂改至三四遍,最后别书一纸贴于原文之上,第二次改本则由别纸抄出。第一次改本原文,与《满洲老档秘录》所载《太宗与袁崇焕第一书》所述大恨七端(除几个字的译文不同外),大致全同。第二次改本,即日本内阁文库所藏《三朝实录》写本的底本。”徐中舒第一次使用了内阁档案中的一件未具名的题稿,发现康熙年间《太宗实录》重修的原因和要求:“原为请旨事。康熙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皇上召臣等至内殿谕,前修《太宗文皇帝实录》内有字义未当,姓名舛错者,可详闻具奏。臣等钦遵谕旨,将第一套满字五卷另行誊录,应更改者更改缮写,恭呈御览讫,[嗣因]今臣等续(改第二套)将原档[陆续]与[原]前修[副本](实录)详加校勘,不惟字义未当,姓名舛错,且有前后颠倒者,有[原档所载]于例应存而遗漏者,有琐屑事务,例不应书而书者,有一事前重复者,[有不书干支止书年月日者],[至于年日干支并未书载],[有]且满汉文对勘,(有)词义舛错(不合)者,有[满汉]词义虽合而汉文近于俚俗,[且][并]语气未顺(者),实录一书载我太宗文皇帝圣德神功,垂宪[后][万]世,[实](允)系大典。诸如此类[似]应增应损,似应重修。前虽未经(誊写正本)告成,然已缮副本进呈御览,(今)臣等未奉[上谕](谕旨不便)[辄]

擅行更改。应否重修,伏候上裁。谨题请旨。(圆括号号为笔者所加,原文为小字——笔者)。”他指出:“原稿所谓原档即满文老档,副本即汉文实录,此两者对勘,可见实录原文,即由满文老档译出。至此次修改,原是因为前后颠倒,重复,语气未顺,所以从这第二次改本出来的现在日本所存的《三朝实录》写本,还得保存最初质实的记录(本内藤氏语)。”正是基于上述对《清实录》改修史料的发现和解读,他得出清朝统治者“他们对于自己的实录,不惮一改再改”的结论。

徐中舒在上文基础上,又撰写了《再述内阁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一文,考订和辨析了清代内阁大库中所藏档案及实录的收藏和变动情况,指出内阁大库分东西两库,东库是实录库,属满本房管,西库是红本库,属典籍厅管,“东库楼上的实录、圣训,原为满本房所掌”。据宣统二年八月所编的“列朝实录、圣训函数档”,计“红绫《实录》函数档满、汉、蒙文各一册,黄绫各一册,红绫《圣训》函数档满、汉各一册,黄绫各一册,共十册”。并根据每册首面上的记事:“本阁实录红本大库,因年久失修,坍塌渗漏,奏请兴修;谨将列圣《实录》、《圣训》,恭请至内银库暂行尊藏。至宣统二年六月,库房修齐,是年八月,仍将红、黄《实录》、《圣训》,移回本库,敬谨尊藏。并将各函本数存失数目,登档注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满本房所掌东库之《实录》、《圣训》,后来仍移回原处,所有各项《实录》,今均为文献馆所有”;而典籍厅所掌管的红本库和书籍表章库中的档案文件,则在移出后归历史博物馆,后散落在外,成为史言所、北京大学等各处所藏的藏品。

在整理档案时,徐中舒还对内阁大库中有关《实录》的档案作了介绍,称典籍厅南厅保存有实录馆档,满本房保存有进实录帮档,蒙古房有蒙文实录档、实录收发档、抖晾实录档(蒙文)、实录馆编号簿等,皆收藏于故宫文献馆中。内阁大库《书档旧目》的第二十目登录的都是实录馆的修书档。这就为我们研究清代实录提供了史料上的线索。

徐中舒还特别对早期残存下来的三朝《实录》给予关注和重视。《实录》稿纂修之后,照例须焚毁。然而,徐中舒通过实际的考察和研究,认为:“这虽沿袭明代的旧例,但清代《实录》稿,则未必全毁。文献馆藏清史馆档案,尚有稿本数种,或于文中分注出处,或有涂改增删之迹,皆属实录馆物,可见《实录》稿本并非全数焚毁”,并进一步列举本所所藏的《实录》残本道:“康熙以前的三朝《实录》及《宝训》,因年代较远,



及屡次修改之故,其屡次改稿,及零星散叶,在史言所档案中,也还发见了十多本。”在保存下来的康熙以前的三朝《实录》中,他特别提到了《满洲实录》,并对其源流和价值作了讨论:“满文老档外,汉文《太祖实录图》又称《满洲实录》,成于天聪九年八月,《太祖武皇帝实录》(按:太祖崇德五年谥为武皇帝,后于康熙元年改谥为高皇帝),成于崇德元年十一月。这两部《实录》,都成于沈阳朝廷,其质实的程度,当与满文老档相去不远。《太祖实录图》原本存佚已不可考,乾隆时重绘两部,现在一存文献馆,一存崇谟阁。《太祖武皇帝实录》现在存文献馆。”他对这些灰余《实录》的价值十分看重,称:“我们晓得清初实录,曾经数次涂改,同时又大兴文字之狱,屡申禁书之令,凡与实录相抵触的史料,无不摧毁殆尽。易世之后,往日违碍禁书,稍稍间出,然存者不过千百之十一。而此数百载严扃之大库秘藏,其中有未经涂改的《实录》,有两次涂改的《实录》残稿,有沈阳移来的开国期旧档。我们不但藉此可以看到《实录》底本,我们还可以利用沈阳旧档来校对这个底本。”

徐中舒及其所在的史语所,在整理内阁档案时,贯彻了所长傅斯年倡导的科学精神和近代学术方法,傅斯年在《史料论略及其他》中提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的关系,指出:“直接材料的来源有些限制,所以每有偏重的现象”,“若是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则无从使用”,“直接材料每每残缺,每每偏于小事,不靠较为普遍,略具系统的间接材料,先作说明,何从了解这一件直接材料”<sup>[21]6</sup>? 直接史料中有一种“古公廨”所藏史料,史语所收藏的清内阁大库档案正属于此类,它们比较凌乱、孤立,若不用比较系统的间接史料《清实录》加以说明,则无从下手研究。史语所和徐中舒等人是将《清实录》纳入近代学术方法中通盘考虑的。也正是在做这一工作时,徐中舒对《清实录》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尽管徐中舒并未专撰有关《清实录》的论著,但他在整理内阁大库档案时写的这两篇论文,已对《清实录》作了介绍和比较深入的探讨,足以证明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骄人成就。

### 五 伪满学者对《清实录》的整理与研究

就在关内学者整理和研究《清实录》前后,关外的日本以及伪满洲国的学者也开始对《清实录》予以极大的关注。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早在清末便于沈阳崇谟阁发现了无图的《满洲实录》,引起了国人和日本人对《清实录》的重视。1930年,辽宁通志馆石印了《满

洲实录》,去掉满、蒙两种文字,只印了汉文内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日本关东军和伪满的“满日文化协会”决定影印崇谟阁所藏的全套大红绫本《清实录》,日方以杉村勇造等为代表,伪满方则由郑孝胥、罗振玉牵头。罗振玉在奉天九纬路的博物馆附近借到十多间洋房,成立了《清实录》出版事务厅。1934年12月正式开始整理,1936年由日本东京大藏出版社出版,命名为《大清历朝实录》,包括从太祖至德宗的11朝《实录》以及《满洲实录》和《宣统政纪》,分装122帙,每帙10册,共1220册,但印数甚少。

罗振玉很早就萌生了整理和出版《清实录》的意愿。还是在1917年时,他便给清史馆员柯劭忞写信,提出让清史馆负责出版全套《清实录》的要求,说如果清史馆不能出的话,他自己也会想办法出。于是柯劭忞回信道:“承示《皇朝列圣实录》,拟求赵次珊(即赵尔巽)尚书付梓,如事不谐,则公自任之。仰见报国之忧拳拳不已。惟《列圣实录》卷帙太繁,德宗皇帝一朝已至八百余卷,总计全书不下万卷哉。刊此久之不易集也。”<sup>[6]</sup>显然未满足罗氏的愿望。于是,罗振玉借助日本和伪满的力量,编印了《大清历朝实录》。在做这件工作的前后,他还于1933年以“奉天史料整理处”名义将康熙年间重修时的稿本《朱彝尊原纂太祖高皇帝实录稿本三种》(初修存7册,再修存5册,三修存卷一1册和卷三1册)影印出版。他认为这三种稿本是由内府流出的本子,其为清代官方档案性质无疑。于是,将这三种稿本影印成《太祖高皇帝实录》稿本三种》一书,线装四册。内分初、二、三修本三种。罗氏介绍了原稿的残存情况:“初修本存七册。首册迄癸未二月;二册起癸未七月,迄甲申九月(原注:两册间缺五、六两月);三册起乙亥正月,迄庚辰十一月;四册为天命四年五、六、七月;五册起天命四年八月,迄五年十一月;六册起天命六年正月,迄十一月(原注:此三册相衔接);七册起天命九年正月,迄十年十一月。第二次稿本存五册。第一册至癸未正,后题署卷一;第二册起甲申正月,至乙酉止(原注:此二册相衔接);三册起天命五年,至六年六月(原注:此二册相衔接);五册署卷九,起天命九年,至十年末。第三次稿存卷一及卷三,首尾完全,其分卷则与皇史宬定本同矣。”<sup>[22]《序言》</sup>罗振玉对这三种康熙本《太祖实录》的整理和印刷,有重要的学术贡献<sup>⑤</sup>。

尽管罗振玉与清史馆馆员的政治立场相同,都属于忠于满清的清朝遗老,但在研究方法上,却有很大

的不同。罗振玉是与日本学界联系密切的中国学人，拥有近代学术方法和眼光，与王国维并称“罗王学派”，他在整理《清实录》时，特别注重对它的鉴别，十分重视初纂本的价值，因此才特别印行了《〈太祖高皇帝实录〉稿本三种》。

## 六 结语

民国时期，不同的学者怀着不同的目的，对推翻不久的清朝历史及其文献给予密切关注，对清代内阁大库档案以及《清实录》等史料进行了应用、整理和研究。清史馆馆员及罗振玉基本上属于清遗民群体，在缅怀清朝的心情下，用《清实录》、清国史等史料，编纂《清史稿》一书，出版《〈太祖高皇帝实录〉稿本三种》等书，以为旧朝存史。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曾利用接触《清实录》的便利，应用其史料，撰写清朝私史，如《清史大纲》等。与清遗民相反的是像孟森这样的共和派史家，受其早年政治活动的影响和北大的学术背景，对清廷篡改和修饰《清实录》的行为极其不满，给予了最为激烈的批评，对《清实录》改修本的史料价值予以否定。然而，作为清史研究大家，孟森在学术活动中又广泛应用《清实录》的史料，特别看重初纂本的史料价值。介于清史馆员和孟森之间的，是信奉科学观念和近代方法的史语所和故宫博物院的年轻学者，他们对《清实录》的改修和价值，给予了客观和中立的评价。尽管立场和方法各异，但民国学者们在应用、整

理和研究《清实录》上都比较认真和敬业，使民国时期《清实录》的研究工作一开始就步上一个台阶，对以后的研究事业起到了重要的铺垫和启发作用。

民国研究《清实录》的学者，基本上都依托于一个学术机构，或清史馆，或文献馆，或史语所，或大学。他们对《清实录》的研究尚属初步，有专门论文发表，但无专著问世，以应用和整理居多。不过，他们开辟了后世研究《清实录》的道路和格局，并为后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民国学者对《清实录》的整理与研究，在“国府”迁到台湾后，仍在中研院史语所、台北故宫博物院中沿续。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后，也开始重视《清实录》的整理和研究，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了全套的《清实录》，特别是“清史工程”的上马，使得《清实录》的整理与研究更受重视。

民国学者对《清实录》的整理、应用和研究，有其特殊的标本意义，是民国学术整体现象的一个具体缩影；在学术活动中，既有像清史馆遗老那样的传统观点和方法，又有像共和学者孟森那样的尖锐观点和激进思想，复有史语所、文献馆学者那样的近代方法和科学眼光，在旧制度被推翻、新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的过渡时期，民国学人的学术观点可谓古今杂陈和中西并立，虽然相互对立和彼此争鸣，但却在传统与近代之间尝试承上启下，又曾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努力沟通中西。

## 注释：

- ①目前似只有杨立红、朱正业的《〈清实录〉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3期）有所介绍，但也比较简略。
- ②该《清实录》以及《清史列传》抄本，20世纪50年代由刘承干以6000元转售复旦大学图书馆。参见：谢贵安《〈清实录〉世传版本考》，载《明清论丛》第十辑，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
- ③商鸿逵称：“这部书是我的老师孟森先生当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授课的讲义稿。”见《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前言。
- ④单士元此处所称方甦生撰有《清代实录纂修考》有误，实际上是《清太祖实录纂修考》。
- ⑤徐丹俊指出：这三种《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稿本的价值，“在一般传抄本之上。更因为三种稿本记载时间有所重叠”，即部分内容重合，可以考见康熙重修《清太祖实录》过程中的递变轨迹，“对于当时修撰的思想、义例以及文字制度等细节的研究，有超出雍乾校订本之上的价值”，是研究有关努尔哈赤实录纂修史的极好材料。参见：徐丹俊《〈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康熙重修本辩证》，《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 参考文献：

- [1]于式枚，等. 开馆办法九条[G]//许师慎. 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面意见汇编. 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9.
- [2]金兆蕃. 拟修清史略例[G]//许师慎. 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面意见汇编. 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9.
- [3]朱师辙. 清史述闻[M]. 北京：三联书店，1957.
- [4]张尔田. 清列朝后妃传稿[M].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 [5]张笑川. 张尔田与《清史稿》纂修[J]. 清史研究，2007，(1).
- [6]王宇，房学惠. 柯劭忞致罗振玉手札廿三通[J]. 文献，2001，(1).

- [7]冯尔康. 清史史科学[M].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4.
- [8]赵尔巽, 等. 清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9]张崑. 南浔刘氏嘉业堂观书记[J]. 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 1935, 4(3).
- [10]孙家红. 明清史学大师孟森传略[M]//北大的大师们.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
- [11]孟森. 明清史论著集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2]孟森. 明清史讲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13]孟森. 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4]那志良. 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清实录》(下)[J]. 大陆杂志, 1963, 27(5).
- [15]庄吉发.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叙录[J]. 图书季刊, 1970, 1(1).
- [16]单士元. 整理清代实录记[J]. 故宫博物院院刊, 1984, (3).
- [17]方甦生. 清太祖实录修纂考[J]. 辅仁学志, 1938, 7(1, 2).
- [18]方甦生. 清实录修改问题[J]. 辅仁学志, 1939, 8(2).
- [19]徐中舒. 内阁档案的由来及其整理[J]. 明清史料, 1930, (1).
- [20]徐中舒. 再述内阁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J].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33, 3(4).
- [21]傅斯年. 史料论略及其他[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 [22]罗振玉(编). 朱彝尊原纂太祖高皇帝实录稿本三种[M]. 沈阳: 奉天史料整理处, 1933.

## On the Scholars' Application, Filing and Research of *Factual Record of Qing Dynast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1912—1949)

XIE Gui-an

(a. School of History, b. Center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Stud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scholars from the institute of the Qing Dynasty history, literature museum,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nd Peking University, with their respective purposes,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Factual Record of Qing Dynasty. Officials from the institute of the Qing Dynasty history and Luo Zhenyu,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past dynasty, compiled *Qingshigao* and directly researched the early version of the record. Nevertheless, republic historians, such as Meng Sen, a professor from Peking University, expressed strong dissatisfaction and fierce criticism on the behavior of altering or modifying *Factual Record of Qing Dynasty*. On the other hand, Meng Sen also adopted reliable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the *Factual Record of Qing Dynasty* to his own research. The scholars from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nd the young scholars of the Palace Museum believe in the concept of science and the modern method. They give an objective evaluation on the *Factual Record of Qing Dynasty*. Although with diverse stands and purposes, those studies had played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subsequent research.

**Key words:** scholar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 — 1949); *Factual Record of Qing Dynasty*; institute; historiography

[责任编辑: 凌兴珍]